

毕生的事业

亚·米·华西列夫斯基著

供内部参考

毕 生 的 事 业

〔苏〕亚·米·华西列夫斯基

柯 雄 译

上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Александ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Василевский

ДЕЛО ВСЕЙ ЖИЗНИ

М., Политиздат, 1973.

根据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 1973 年版译出

毕生的事业

〔苏〕亚·米·华西列夫斯基

柯 雄 译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天津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开本 22.25印张 398,000字

1977 年7月第1版 1977 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11002·482 定价上下册 2.15 元

(内 部 发 行)

出 版 说 明

本书是亚·米·华西列夫斯基的自传体作品。作者军身人出，青年时代曾在沙俄军事学校念书，十月革命后参加工农红军，在苏军服役至今。苏联卫国战争期间曾历任苏军总参谋长、苏军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成员、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司令、远东苏军总司令等职。

作者在斯大林格勒大会战、解放顿巴斯、克里米亚、白俄罗斯以及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战役中负责主持军事部署，在东普鲁士历次战役和在远东粉碎日军的各次战役中亲自指挥作战。书中叙述作者的生平经历以卫国战争时期为主，对以上历次重要战役的组织、准备和实施、指挥以及战时苏军大本营的战略考虑等活动均作了较详细的叙述，因此本书对苏陆军的发展和作者在第二次大战期间指挥和参与的一些战役，提供了不少资料，有一定参考价值。

本书是在一九七三年苏修加紧宣扬所谓“军事爱国主义”的时候，为适应苏修扩军备战的需要而出版的。书中贯穿着诸如唯武器论之类资产阶级军事观点。作者本人曾参加苏修的反华大合唱，这种反华思想在书中的有关部分也有所流露。

目 录

致读者·····	1
少年时代·····	7
生活的新阶段·····	17
战火的洗礼·····	25
保卫苏维埃的早期斗争·····	43
抗击干涉军·····	58
团的经验·····	72
在走向改建的道路上·····	88
在军队脉搏跳动的地方·····	105
“大战”前夕·····	120
最后的和平岁月·····	132
战争开始·····	152
莫斯科城下之敌·····	193
1942年的春夏·····	226
在顿河和伏尔加河之间·····	256
伏尔加河会战的胜利·····	286
在顿河上游·····	347
在库尔斯克弧形地带·····	381
解放顿巴斯·····	417

夺取第聂伯河	442
在第聂伯河右岸	463
粉碎敌军克里米亚集团	502
白俄罗斯战役前夕	533
夺回白俄罗斯国土	566
争夺波罗的海沿岸之战	587
1945 年春在东普鲁士	611
在远东	646
后记	674

致 读 者

伟大卫国战争这些历史上的严酷年月，离我们已经愈来愈远了。但是，时间并不能使人们将它忘却，并不能使它从人民的记忆中消失。我们对法西斯德国的胜利，乃是对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的胜利，是光辉的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

关于这场战争，已经出版了很多书。尽管这样，人们对这样一些书籍的兴趣并未稍见减弱。每一部有关苏联人视作神圣的这场战争的真实的新作，都是我国人民为了自己祖国的自由和独立、为了和平和进步所立下的伟大功勋的新的见证。

在伟大卫国战争年代极端残酷搏斗的战火中，苏维埃多民族国家和它的武装力量经受住了考验，证明是坚不可摧的。军事艺术的成熟性，同自认为当时资产阶级军队中最有经验的法西斯将军正面交过手的我国军事领导干部的素质，都经受住了考验。

我感到庆幸和自豪的是，在祖国最困难的年代，我全力参加了我国英勇武装力量所进行的斗争，并和它一起饱尝了挫折的心伤和胜利的喜悦。我国的军事干部在战争中成长了起来，并受到了锻炼。象苏联的其他军事

首长一样，我也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成长起来并得到作战经验的。

伟大卫国战争使我在总参谋部中担任了工作，担任作战部副部长的职务，少将军衔。1941年8月1日，根据党中央的决定，我被任命为作战部部长和副总参谋长。自1942年6月至1945年2月，我领导了总参谋部，同时担任副国防人民委员。后来，我还被赋予过方面军司令和最高统帅部成员的职责，再以后还被赋予过远东军总司令的职责。

可见，几乎在伟大卫国战争整个过程中，我同武装力量的领导机构一直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在这本书中我要用较多的篇幅首先叙述最高统帅部、它的主要工作机构——总参谋部的活动，以及我国武装力量的主要领导干部——方面军和集团军的司令、军事委员会和参谋部的活动。

这本书是以我所熟悉的事实材料为基础的，而且这些材料又为档案文献（其中大部分是未发表过的）所证实。我的回忆录的主要目的是要说明辉煌胜利是怎样在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取得的；向我们年轻的一代讲一讲我们的军事领导机关在武装斗争中运用了哪些方法和形式。在这场斗争中我们也有过错误和失败，在书中我也将讲到这些。然而，它们自然并不是我们军人取得胜利前所经历的艰苦道路上的主要问题。

在这本书中，我想努力说明苏维埃国家军事力量的

日益增长，苏联军人战斗素质和精神素质的形成，军事科学的发展，我国的军队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成长。应当坦率地说，我国所有的军事首长是苏维埃军事艺术的主要原则——坚决、灵活和机动的彻底体现者。还在战争的头几个月里，他们就表现出了作为军事领导者的最珍贵的品质——对现代战争的本质与特性有完全深刻的理解和预见最复杂战役的进程和结果的洞察力。

这本书将对最高统帅部代表的工作给予足够的注意。

时常有人问我，在战争年代与战略战术领导部门有关系的军事首长，多数人都写了回忆录，而且他们的回忆录得到了应有的赞扬和承认，为什么我到现在还没写出自己的回忆录呢？

我对描写这次大战的回忆录评价一向很高。我国的军队和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在同法西斯斗争中所建立的功勋，在世界历史上是无与伦比的。宣传这一丰功伟业对于培养苏维埃爱国主义精神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我的这本书迟迟到现在才出来，是由许多因素决定的。在战争正在进行的时候，我当然连想都没想过将来什么时候还要写上一本关于战争的书。所有的心思都用到打仗上去了。个别的回忆录作者常常援引他们在战争期间写下的日记。当然喽，这是他们的个人事情。不过，应当说，按照统帅部所规定的战时纪律，他们是不应当这样做的。老实说，我也不明白他们怎么会有时间

和精力做这种事情！至于我们这些人，总参谋部的负责干部，国防委员会和最高统帅部所有讨论具有战略意义作战问题的会议参加者，除了一般性的内容和数字（当然这也是基本的东西，但它们对于外人是说明任何问题的），是不准许在自己的工作记事本上记载其他任何东西的。党认为，武装力量各级领导保守国家机密和军事机密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毫无疑问，战时在这个问题上如此严格要求是完全正确的。由我们起草而由统帅部批准的给方面军的训令是已经作出决定的主要文件。根据统帅部的命令，所有军团、兵团和部队的司令部要把军事行动的经过记录在自己的日志中。这些日志现在给回忆录作者，包括我在内，以很大的帮助。

为什么我久久没有写出自己的回忆录，一个原因是我在战后很长时间内工作一直非常忙。1946年3月，我再次出任总参谋长和国防部第一副部长。1949年，我被任命为武装力量部部长，自1950至1953年我担任陆军部部长。长时间的病也妨碍了我写作本书。

战争结束后不久就写出过第一批战争回忆录。我记得很清楚，军事出版社出版过两个回忆录集子：《攻打柏林》和《从斯大林格勒到维也纳》（讲第24集团军的英勇战斗历程）。但这两本书都没有得到И. В. 斯大林的批准。他那时说，一个伟大事件刚刚过去不久，人们还没来得及平静下来，激情还没冷静下来，这时写回忆录还为时过早，写出来的东西也会缺乏应有的客观性。尽管我对

这种说法有不同意见，但在一段时间内它不能不影响到我写作回忆录的情绪。

我收到我国的军人和劳动者写来的许多信件，都要求我谈谈战争，谈谈我是怎样成为一个军人的。所以，我在书中用了几章的篇幅写了我的生活和伟大卫国战争前的经历。

作 者

少年时代

童年。基涅什马的生活。“粮食委员会”。
科斯特罗马和科斯特罗马人。在神学校。
战争前夜。

我在伟大十月革命以前的经历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我出身于神职人员阶层。在那时的俄国这种出身的人是成千上万的。我在沙俄军队中当过军官。这种人当时在俄国也很多。1917年，不仅对俄国，而且对整个人类都是一个分水岭。千百万人都面临这样一个问题：你跟谁站在一起？你站在街垒的哪一边？于是就出现了一种情况：维护旧制度的“团结一致的群众”急剧地分化了。一些人加入白匪军的营垒，另一些人（相当多的人）参加了苏维埃政权捍卫者的行列。这其中就有我一个。从那时起，我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武装部队里自豪地服务了半个多世纪。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一个沙俄军队的上尉怎么竟成了一名红军指挥官、共产党员，还被选为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央委员呢？我的经历，就象一滴晶莹的水，反映了我这一代许许多多人的命运。十月革命是一个从根

本上改变他们的整个生活和思想方式的事件。

我的生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个典型……

伏尔加河流域中部平原是从伊凡诺沃州和科斯特罗马州交界处开始的。这个平原上，现在还有大片的森林，有翁扎河、涅姆达河、卢赫河、科斯特罗马河流过。在一些小城的周围有许多小镇，在城镇之间座落着好些古老的村庄。这个土壤瘠薄、满是云杉的边远地方就是我的故乡。如果乘轮船沿伏尔加河自科斯特罗马向下游驶去，途经美丽如画的普列斯城，一直可驶进以亚麻织品著称的基涅什马城的码头。这条俄罗斯大河两岸尽是大片的水淹草地。从基涅什马城向西南方向有“铁罐子”——铁路通往伊凡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向南有两条大路：一条通往维丘加，一条通往尼基季诺大村庄。这是我们的乡中心。在森林环抱的大平原的中部，与它紧挨着还有个巴特曼纳商业村。商业村附近有一些小村落。流入伏尔加河的我们可爱的叶尔纳季河由东向西穿过平原。

我故乡的这块极平常又极狭窄的小地方，对我来说是特别亲切的。在它的西边，距巴特曼纳大约五公里的地方，有个诺沃波克罗夫斯科耶村，我的童年和少年同它有着密切的联系。当时那里总共只有三幢房子。现在这个村子已不复存在了。但是，直到现在我不仅清楚地记得诺沃波克罗夫斯科耶这个村子，而且还清楚地记得它邻近的戈尔基、瓦胡特卡、科贝利诺、巴尔杜基、拉古

希和一些别的村子。孩提时，我走遍了这儿所有森林。那儿有许多野鸟，有各种各样的蘑菇和野果。跟农民们（我现在还清晰地记得他们好些人的面孔）一起割草，干一些别的农活。我的学习就是在这里的一所教会办的小学开始的。

我的童年是在长年的贫困中度过的，经常为了一块果腹的面包而去劳动。我的父亲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在他十七岁时失去了自己的父亲。他的母亲，即我的祖母，很快就改嫁给县地方自治局的一个小职员。她有了新的家庭，父亲只得自谋生活。怎么办呢？他仅有的就是他的一副好嗓子。有人劝他到科斯特罗马大教堂的合唱团里找个差事做。他从科斯特罗马回到自己的故乡，在基涅什马县（现在是伊凡诺沃州维丘加区）新戈利奇哈村当上了教堂合唱团的指挥和诵经士。不久，他和同县乌格耶茨村的一位诵经士的女儿娜杰日达·伊凡诺夫娜·索科洛娃结了婚。到1912年家里已经有了八个孩子。头生子亚历山大夭折了。德米特里是个医生，后来成为红军军官。叶卡捷琳娜当了几十年乡村教师，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失去了丈夫和儿子。我排行第四。叶夫根尼是弗拉基米尔州的集体农庄主席和农艺师；维克托是空军领航员；叶列娜和维拉是农村学校的工作人员；玛尔加丽达是科学研究所的实验员。

我于1895年生在新戈利奇哈村。过了两年，父亲被派到诺沃波克罗夫斯科耶当神父。父亲的微薄收入不足

以满足我们这个多子女家庭甚至最起码的需要。我们兄弟姐妹从小到大都在菜园和田地里从事劳动。冬天，父亲有些额外收入，做些木工活，做些地方当局定做的学校用课桌、饭桌、门窗以及给养蜂场做蜂箱。

我们的家境还不是最坏的。附近的农民更苦。他们耕作小块贫瘠的土地，几乎从来不施肥料，简直无法维持生活。因此，许多男人以及一些妇女便到别处去谋生。我们县，在科斯特罗马省就算得是个工业县了，有许多纺织厂，特别是擀毡厂。农民经常是到科诺瓦洛夫、拉佐连诺维、科科列夫、莫罗基内、明多夫斯基和其他财主的工厂里去做工。这些需要养家的人一年到头，包括夏季和农忙季节，都得在离家二十俄里外的工厂里干活儿。他们住在工厂的工人集体宿舍或者借宿，很少有带家的。不愿意远离农村的，就到瓦胡特基、基斯利亚奇赫、多勃雷尼赫、克鲁季齐、拉古尼赫的工厂去当雇工。十岁、十一岁的少年就得进企业里当徒工。虽然他们有时要和成年人干一样的活，可是付给他们的钱却比成年人少。留在农村的农民在木材加工劳动组合里赚些外快；如果有匹瘦马，就给工厂运送燃料；有的根据厂主的订货在家里擀毡靴。妇女和姑娘们织手闷子、手套和袜子。

农民和工人的密切交往对农民的意识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唤起了贫苦农民对当时旧制度的仇恨。有一些事情足以说明那个地方的工人的情绪。有几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

1907年在基涅什马出现了工人代表苏维埃。这个组织在历史上叫“粮食委员会”，是1907年2月15日在全市数千人的群众大会上推举出来的二、三十个工人和几个农民组成的。1906年是歉收年。谷物和面粉价格急剧上涨。确切地说，物价是那些素来想靠人民的苦难发财的商人哄抬起来的。基涅什马工厂的工人宣布了罢工。卡拉什尼科夫工厂的织布工、拉勃金工厂的漂白工、杰米多夫企业的锯木工、波德希瓦洛夫工厂的翻砂工、阿加波夫工场的陶器工和其他许多厂的工人都聚集到集市广场上来了。就象当时人们所说的，举行了“大会”。“粮食委员会”就是在这次大会上成立的。得到城市劳动者和附近农民支持的“粮食委员会”，为了履行大会参加者的委托，便行使自己的权力，对基涅什马的存粮施行了登记，强迫商人按照委员会严格规定的价格出售粮食。委员会的历次会议都是在市议会大楼里完全公开地举行的。

过了两个星期，从科斯特罗马向基涅什马开来了一支哥萨克。当局胡作非为。横行无忌。警察冲进议会大楼，逮走了十八名委员。开始了大搜捕。A. H. 奥斯特罗夫斯基剧院被关闭。剧院的房子成了哥萨克骑兵连的兵营。图书馆、阅览室被捣毁。“粮食委员会”被解散。

地方监狱有人满之患。布尔什维克不顾这种大规模镇压仍在城里散发传单。有份传单是这样说的：“同志们！暴虐无道不会永久地、也不会长时间地统治着我们